

神學書評

Kwong, Chun-wah. *Hong Kong's Religions in Transition: The Restructuring of Religions during Hong Kong's Incorporation into Mainland China* (1984-1998). Waco, Texas: Tao Foundation, 2000. 201pp.

鄭振華。《過渡中的香港宗教：回歸時期香港宗教的重整（1984-1998）》。201頁。

本書是作者鄭振華在德薩斯州貝勒大學修讀博士學位的畢業論文編印本，內容論及香港宗教在1997年政權移交中國前後的變化，特別是這對基督教可能產生的影響。就題材而論，這是筆者在歐美神學院系中僅見，有關九七前後香港宗教與基督教的研究，故值得特別注意。

翻閱本書，筆者的第一個印象是它並不像學位論文，至少跟筆者所曾讀過的大多數論文不相似，因它並沒有有一個要議論的正題 (thesis)，像是從起初便旨在為一本半通俗性的論著而寫的。作者為了遷就對這課題所知不多的西方讀者，書中竟然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非關書名（假設這是全書的題旨所在）的直接議論，而僅是其背景導論。這包括第二章關於中國宗教的歷史描繪，第三章的香港宗教發展史，及第四章的鄧小平改革時期的中國儒學復興與香港回歸前後的儒教復興。真正論及香港宗教在政權移交前後的變化的，只有第五章而已。這樣子的篇幅分布，雖然是可理解（因讀者的需求），卻仍是非常規的。這是筆者說它像一開始便是為對中國與香港所知無多的西方人而寫的導論介紹，過於專業的學位論文的原因。

說本書前四章皆為背景介紹，應不是苛刻之言。實在，即使作者博覽群書，議論精闢，也不可能就六千年的中國宗教發展，包括儒、釋、道的教義內容，三教合流與民間宗教的性質，香港的殖民地統治與在華傳教史，以至宗教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統統在第二章用約三十五頁的篇幅，便能作出專業性、具原創性的說明吧！同樣地，我們也不可能想象作者能在第三章用四十餘頁的篇幅，便把百年的港英歷史，包括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政策及其轉變、香港的政教關係、香港各大宗教的發展，以及九七問題的政治社會脈絡各課題，作專業性、具原創性的說明。第四章四十餘頁所肩負的敘述使命亦是過於繁重

的，它包括了鄧小平的改革與中國宗教政策的轉變、儒教在中國的復興、新加坡政府的「儒教」(?)威權統治、香港在回歸後頭十八個月的情況、1984至1997年間與宗教自由相關的課題，及香港宗教自由在董建華治港時期可能有影響。簡括地說，無論從其議論範圍的過分廣闊，所用的又幾乎都是二手與三手的評論著述而罕見原始材料，乃至在觀點創新與突破上的不足，都可印證筆者對本書性質的質疑。

要是全書有五分之四的篇幅是背景介紹，那餘下的一章(不論其篇幅長短與比例)又能否算是學位論文呢?抱歉它也不大像是。在筆者眼中，它像雜誌的政治評論過於嚴謹的學術研究。作者在九七前後曾對好些香港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領袖(或活躍人物)作了一些調查訪問，搜集他們對九七前後香港的宗教及基督教的變化，或可能變化的印象和意見。雖然作者在書中沒有直言，但就其附列書目，卻可知他合共訪問了十四人，這當然無法構成任何可供量化的數據，甚至不能說反映了香港教會的一般性意見。因為且以基督教為例，熟悉有關香港教會情況的人，大抵單提被訪者的名字，便已估計到如陳慎慶、盧龍光、郭乃弘等對香港及香港基督教會有甚麼意見。注意，本書搜集的是「意見」而非「事實」；作者在書中也不止一次承認，即使說有某些「意見」乃建造在一些已發生「事實」的蛛絲馬跡上，但回歸才十八個月，現在談實況仍言之尚早。這些對「事」的解說亦肯定是過分引申與捕風捉影居多；並且受訪個人的政治與宗教取向，遠較客觀的事實更影響他們的印象與意見。這樣，作者只是收集了若干人物對香港基督教可能出現的變化的意見，連將這些意見者與他們的意見徵分類，再進行分析的工夫亦省卻。筆者除了說本書為一家之言的時事評論外，也不知該如何將它分類。坦白說，筆者不明白作者在前言部分提到本書採用「現象學的方法」，在實踐上是怎麼一回事。

筆者得指出，本書作者乃至他所徵引的受訪者的推測與意見，都是有可能的，但卻是建造在許多政治與宗教前設(如反共與恐共)及「陰謀論」(中央或特區政府有一套已成形而自覺、未成形而又不自覺的宗教政策，或至少是宗教處理趨向，所發生的偶然事件乃此種明顯或隱含的政策的片斷反映)的基礎之上，其所反映的與其說是政治與宗教的事實本身，不若說是「小事化大」「泛政治化」「泛陰謀化」的九七癡候群症，而這個癡候群症狀乃由某些傳媒、政客與學者(包括部分受訪者)聯合吹噓出來的，所以只能說是他們眼中的事實世界。

舉例言，即使董建華真的是忠誠的儒家信徒，又會自覺或不自覺推動儒教的發展，我們也難以想象他的個人宗教傾向，會構成對香港政教關係或「宗教

政策」任何實質改變的影響。筆者相信，他既無此意圖，亦無此能力。即使基督教的辦學與社會福利空間可能減少（按：作者在提到這個「傳聞」的同時，卻又對政府將東涌的綜合社會服務批給本已擁有龐大社會資源的聖公會表示憂慮），而其他宗教團體相對地爭取到較多的社會空間與權利，但若將這趨向說成是政府宗教政策的任何改變，甚或是與董建華的儒教傾向有關，便教人匪夷所思了。

筆者無意對全書各個令人產生疑問的觀點作冗贅的評論，只想特別一提：作者混淆了「儒家思想」「儒教」與「儒教精神」三者，將唐、牟在五十年代復興新儒學、中國大陸當代儒家的復興、香港的孔教、新加坡政府近年對儒學精神的弘揚，與董建華更形寬鬆的所謂發揚傳統文化的美德，共治一爐，皆指為是儒教的復興，藉以與（作為宗教的）基督教作此消彼長的對照比較，這是相當有問題的。然而，這個對照比較卻是全書貫串性的觀點及研究前設。關鍵詞彙的定義不清，討論時便難免產生邏輯顛倒混亂的情況。

筆者由衷地欣賞本書在取材選題上的創意，但期望這僅是作者對這課題研究的導言，日後我們能有機會拜讀更多他的深入研究成果。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